

罗尔斯理论的悖论与正义的实践生成

鲁品越*

〔摘要〕 罗尔斯将超功利的“纯粹正义”确定为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然而这种正义仍然建立在“功利的平衡”的基础上;将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下的人拉回到处于“无知之幕”的初始状态以得到评判“公正”的标准,然而人们一旦离开其所处社会关系下的实践就会失去其评判能力。罗尔斯认为人们在“无知之幕”下为了自我保护必然选择“最差社会地位下的最好状况”的制度设计,以达到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关照而实现“平等”,而实际上这不仅以承认不平等制度的合法性为前提,并且是违背现实的空想。实际上,正义观念在人类实践中生成,正义的制度在人们通过内在联系而形成整体“社会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最根本的功利——人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 罗尔斯理论;“正义—功利”悖论;“无知之幕”悖论;“最大最小”悖论;实践生成

在《正义论》这部著作中,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正义观,认为纯粹正义是超越功利的最高价值;反对直觉主义正义观,主张不依赖于人们的直觉诉求的正义原则,而存在着确定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由此,他建立了以“正义”概念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学说,认为只有通过确立纯粹正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才可以建立符合正义的永恒的社会制度。这种当代的依据普世价值建立正义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已经被许多人奉为道德真理,而由此所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被认为是宇宙中唯一天然合理的制度。在今天,这种政治道德观念已经被推崇到近乎神话的地步。

然而,这部著作及其表达的思想体系,真有如此永恒不变的真理与价值吗?非也!从理论上说,罗尔斯的理论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逻辑悖论;从实践上说,这个充满悖论的理论如果真的付诸实施,给当代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东西,将绝不是所谓“正义”,而是巨大的灾难,因为它乃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当代中国决不能按照这种所谓的先验的“普适价值”所设计的制度来影响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而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生成具有社会正义的制度。

一、罗尔斯的“正义—功利”悖论与正义标准的实践生成

人类社会究竟应当以功利(包括个人功利和社会集体功利)作为首要价值,还是以超功利的“纯粹

* 哲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33。

正义”作为首要价值？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先前是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认为个人功利是最高价值，符合功利价值的自然就是“善”，就是正义，因此“正义”源于“功利”。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个人功利与集体功利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边沁主张二者天然统一，并无矛盾，集体功利无非是个人功利之和：“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那么社会利益又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①因此每个人都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就自然实现了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而穆勒认为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具有功利价值。因此，如果个人牺牲能够有利于他人功利，那么这种作为获取功利的手段的自我牺牲行为也具有至上的功利价值。如果我们把这种“自我牺牲”理解为一种“正义”，那么这种正义显然是从属于“功利”范畴的——它之所以“正义”，是因为它能够增进他人的利益。

罗尔斯反对这种将“功利”奉为最高价值，将“正义”归结为“功利”的正义观，认为“正义”本身就是最高价值。他说，“我的目的是确定一个能够代替一般的功利主义、从而也能代替它的各种变化形式的作为一种选择对象的正义论。”^②这种超越功利的“正义”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是社会一切价值都必须服从的压倒一切的第一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③这就是说，正义标准与利益标准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各行其是。如果两者发生冲突，那怕事关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也应当坚持“正义”而置生死存亡

于不顾。那么，这个凌驾在一切之上的绝对正义是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④这就是说，一切国家，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都应当立即实施“平等的公民自由”，而西方基于契约原则的民主政体是这种“正义”的当代唯一形式。因此，不论这种西方政体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也绝对“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立即无条件实施。这就是《正义论》不经任何论证，在此书的开头给我们发布的政治道德的律令。

然而，这条律令本身却陷入无可挽回的逻辑悖论，这就是“正义与功利”之间的逻辑循环所导致的悖论。

按照罗尔斯的“正义至上”原理，正义的标准与功利的标准是完全独立的，否则就没有必要将要求人们选择“正义”而不顾功利。那么，这种独立于功利之外“正义原则”到底是什么呢？罗尔斯说，这一原则就是使“那些抱有不同的正义观的人就可能还会一致同意：在某些制度中，当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没有对个人之间作出任何任意的区分时，当规范使各种对社会的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⑤。而实现这种“利益冲突要求之间的恰当的平衡”的唯一途径是“自由契约”。所以罗尔斯说，“我的目的是要提出一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进一步概括人们所熟悉的社会契约理论（比方说，在洛克、卢梭、康德那里发现的契约论），使之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适合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正是目标。这些原则是那些想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和有理性的人们将在一种平等的最初状态中接受的，以此来确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件。这些原则将调节所有进一步的契约，指定各种可行的社会合作和政府形式。这种

①周辅成主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12页。

②③④⑤[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9、1、2、3页。

看待正义原则的方式我将称之为作为公平的正义。”^①

所以,罗尔斯的超功利的“正义原则”原来不是别的,正是“自由契约”原则。“平等的公民自由权利”的核心是“自由契约”的权利。但是,人们在自由契约时追求怎样的目标呢?按照西方个人主义的公认观点,追求的是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罗尔斯不可能同意这个观点,但他承认正义的原则是“是那些想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使各种对社会的利益的冲突要求之间有一恰当的平衡”^②,所以这种正义原则是“功利的平衡”。我们知道,一切利益都是有条件的利益,从来没有无条件的利益最大化,契约各方在受到各种力量的限制(如供求双方相互限制)的情况下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就是均衡状态。而西方的功利主义讲的利益正是这种均衡状态的利益。所以,在这里罗尔斯的契约正义与功利正义并无区别。为了避免这样的理论结果,罗尔斯提出了下面我们将要分析的“无知之幕”,他认为在“无知之幕”的情况下,每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社会角色,因而不可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只能追求利益上的“平等”。但这种“平等”仍然是一种“功利”状态,所以功利仍然是最根本的正义目标。

因此,罗尔斯从反功利主义正义观开始,但很快就又坠入到功利主义正义观,并且得到下述功利原则:“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③早在19世纪,意大利学者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就提出了帕累托最优:如果社会处于这样的状态,要提高某些人的福利水平必须损害另一些人的福利水平,这就是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状态,也即最正义的状态。因此不能以损害部分人利益来提高其他人和全社会的利益。这种“帕累托最优”是典型的功利主义正义观,罗尔斯所主张的上述正义只是对帕累托最优原则的重申。按照这种正义观,对富人征税是

不正义的,因为这是“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给富人心理带来不痛快。那怕这种“不快”能够救活许多穷人的生命,使许多穷人获得上学的机会。这与罗尔斯所主张的“平等”价值,以及同情弱者的价值(见本文第三部分)是相互冲突的,直接发生逻辑矛盾。

再比如,人们要求消灭希特勒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按照罗尔斯的标准,这种行为应当是“非正义”的,因为这将剥夺希特勒的自由权利,强加给法西斯分子“牺牲”,即使这种剥夺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功利。这显然是非常荒唐的正义概念。或许是为了避免这种荒唐的结果,罗尔斯提出“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④然而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如何比较两种不正义中的谁大谁小?两种正义都是最高原则,“首要价值”,因而是无法比较的。如果要比较其大小,就必须确立一种比“正义”更高的原则,用它来衡量两种不同的“正义”到底谁大谁小:然而这个最高的原则不是别的,正是由这两种“正义”所引起的功利后果。由此又必将陷入到功利主义。

因此罗尔斯想脱离“功利”来谈“正义”,结果是将极度追求功利的“自由权利”当做最根本的“正义”,陷入到极端的个人功利主义观,然后又用“无知之幕”来将这种极端的个人功利主义“均等化”。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超越功利的“正义”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实利益是“正义”的基础,没有现实功利,也就没有“正义”可言。正义本身不是别的,是而且仅是对追求利益的行为的道德规范。传统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的错误不在于“功利”,而是没有能够解决“个体功利”与“社会功利”的矛盾的对功利的规范。

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是建立人道主义的功利正义观,即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出发作为最根本的道德出发点,至上的正义。这是没有任何理由否认最根本的正义原则,因为它直接体现了人和人类的生命的目的自身。对全人类来说是

①②③④[美]罗尔斯:《正义论》,第9、3、25、2页。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最高的人道主义功利原则,是形成某个时代的相对普世价值的实践基础。^① 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在努力实现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不损害其他民族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一旦损害就应当有所补偿,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符合上述最高的人道主义功利原则。对个人来说,就是每个人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他人的生存与发展,一旦社会与他人的生存与发展受到损害就应当进行补偿。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符合上述最高的人道主义功利原则。总之,真正的正义原则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原则及其补偿原则,而这种正义原则是建立的人道主义的功利观基础之上的。人的自由权利是否正义,要按照这个正义原则来衡量。在人类社会实践中,虽然由于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导致不断违背这种基本道德原则的现象,有时甚至非常严重与极端,但这种道德原则作为一种强大的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总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将人类拉回到靠近这一原则的历史轨道上,而不可能长期地无限制地违背这一根本原则——因为那将导致全人类所有阶级与民族的“共输”,甚至人类与民族的灭亡。

二、罗尔斯“无知之幕”悖论与“社会人”道德感的生成路径

把罗尔斯的“正义”观与功利主义“正义”观区别开来的关键概念,是“无知之幕”。在没有“无知之幕”,从而每个人都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站在自己的地位上来争取利益最大化,这就导致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正确地看到,不同社会地位上追求的利润最大化是不同的,由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正义观,从而产生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冲突,特

别是阶级冲突。因此,为了建立关于“正义”的普世价值,罗尔斯必须把所有人都拉回到某种“原始状态”,他们全都“忘记了”(或者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处和将处的社会地位,从而对各种分配方案进行价值评判,由此形成的才是真正的原本意义上的“正义”。“无知之幕”正是这样进入到道德科学的领域的。

“无知之幕”的概念最初起源于199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萨尼(Harsanyi),他在1953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的《福利经济学和风险理论中的基数效用》一文提出以下思想实验:设计对某社会系统中不同岗位进行收入分配的许多不同的方案。而要求参加者对这些方案进行价值判断,选择其中最公平的方案。而在选择完成之后,该系统将关闭,唯有此时这些参加者才会被告知处于该系统的哪个特殊岗位上。这时,“如果某人对该系统关闭时他自己将要处于哪个岗位完全无知,而他又必须做出价值判断来选择某一特殊的收入分配方案,那么,这时他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将显示出我们所要求的最高程度的非人格性”,^②因而最公平。罗尔斯将这一特殊情境下思想实验加以普遍化,提出所谓“无知之幕”概念。

如上所述,罗尔斯要实现的正义是“平等的自由权利”。然而现实社会中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上,具有不同的教育水平、职业、种族、阶级和性别等等。每个地位上的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式不同,并且将是倾向于把最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和行为赋予“正义”性,因而具有不同的正义观。这些正义观之间必然相互冲突。那么,如何实现真正的、超越这些冲突的正义呢?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一词,企图令人们回到超越现在所处的地位的“原始状态”而与所处的现实社会相隔离,得到超越特殊立场的公正的价值判断。被放入“无知之幕”背后的人非常了解关于所讨论事务的一般

^① 鲁品越:《价值层次性与相对普世价值》,《学术月刊》2012 年第 6 期。

^② J. C. Harsanyi, “Cardinal utility in welfare economics and in the theory of risk-tak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3, vol. 61, pp. 434-435; “Cardinal welfare, individualistic ethics, and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5, vol. 63, pp. 309-321.

知识,但不了解自己所处地位的特定的信息、特定环境;知道什么是公正,但不知道自己所持的特殊地位的公正观。这就使这一概念陷入到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

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的目的是使自由契约的各方回到“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中的自然状态。……它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正义概念的纯粹的假设状态。这一状态的实质性特征包括: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位置——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social status),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在自然资源(natural assets)和能力、智能、体力等方面的运气。(甚至还应当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年龄——引者补充)我甚至假定各方并不知道他们特定的善的理念心理倾向。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后被选择的”^①。符合这种“无知”条件的唯一可能是不谙世事的儿童。但处于这种状态的无知儿童却需要有绝大多数成人都不可能具备的非凡能力:能够精确判断各种社会角色在所设计的游戏规则中的丢失与处境,从而做出价值判断。但由于他不知道自己可能担任任何种角色,因此他的价值方案是中立的,不带有任何价值偏见,从而是公正的。这样一来,就要求这个不谙世事的儿童要精于世事:这是典型的悖论。

那么,我们能否叫一个精通世事的成人(从而能够精确判断各种游戏规则对各种社会角色的影响)处于“无知之幕”呢?这同样是荒谬的假设。因为实践的复杂性,人们必须从事某种社会角色的长期实践,才有可能真正了解这些游戏规则对各方利益的影响,绝对不可能从游戏方案的理论中通过逻辑推理来精确地预计各方利益,从而做出价值判断。现在,让所有从事各种角色的人统统实行“选择性健忘”,彻底忘掉自己的角色,而只留下关于在各种游戏方案中各方利益的理性判断。这种人格如果存在的话,一定是一种病态的人格分裂症患者,它将不

可克服的内在逻辑矛盾集中于其自身之中。

其实,真正的正义不是通过近乎梦呓的、自相矛盾的“无知之幕”实现的,而是通过“同情”实现的。“同情”是人类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道德能力。所谓“同情”(sympathy),指依靠自己的想象而置身于他人的情境中,“感同身受”地想象和体验他人所处的幸福或不幸的状态。斯密说:“凭借想象,我们把自己放在他的处境中,设想自己忍受着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并在某种程度上同他融为一体,因而知道他的某些感觉,甚至还会体会到某种与他相同的感受,虽然只是轻微的。”^②这种同情本质上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之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它与物质生产活动中物质性内在联系一起,将社会中不同的人结成作为整体的、充满着内在矛盾的“社会人”。而“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原则,使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在努力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不逐步服从这种最高价值原则,从而逐步达成这种“社会人”的行为规范,形成“相对普世价值”——所处社会的各方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的、能够维持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正义观”。^③这种正义观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关系的改变而改变。

三、罗尔斯“最大最小” 悖论与平等观的实践生成

那么,这些在“无知之幕”背后的社会成员,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对各种社会契约方案进行价值判断,以作出最终选择的呢?按照罗尔斯的理论,由于他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那么他不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因为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是相互冲突的,处于“无知之幕”中的无法选择哪一方的利益最

①J. Rawls, *The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1.

②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英汉对照)》,吕宏波,杨江涛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5页。

③鲁品越:《价值层次性与相对普世价值》,《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大化。因此,他只能希望各方平均分配利益,以便自己不论最后成为哪种社会角色时,都不会比他人享有的利益差。而这种平等的利益“包括机会的平等和收入与财富的分配的平等”。因此,正是依靠“无知之幕”的假设,使关于社会功利的正义原则发生了变化:当每个人明确了自己在社会中的特殊位置之后,他必然追求他的利益最大化,而当他不知道自己将处于哪种地位的时候,他只能希望得到平均的利益。

但是当社会能够通过牺牲平等来换取更大利益时,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也是“正义”。例如不平等可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样的不平等就是正义的(注意,这时罗尔斯又陷入了自我矛盾,因为他是反对牺牲部分人的利益来换取整体与他人的利益的,而不平等必然建立在牺牲部分人的利益的基础上)。于是他得到结论:“当某些不平等最大限度地提高或至少有助于提高社会最不幸阶层的长远期望时,这些不平等就是可以允许的”^①,符合正义的。这就陷入到一种悖论状态:社会最不幸阶层乃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然而牺牲平等所增加的“某些不平等”却能够增进社会最不幸阶层的长远利益!如果说,这两种“不平等”是反向的,即用一种不平等去克服另一种不平等(例如对弱者进行扶持),那么这是对不平等的消除,而不能作为“不平等”来看待。

因此,在罗尔斯看来,从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立约者立场出发,得到的“平等原则”与“差别原则”(不平等对平等的有效率替代)是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进而言之,在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这些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立约者,由于惧怕自己会处于最不利的情况,这两个原则就表现为“最大的最小值原则”(maxi-min rule)。这时不但此人的地位不确定(无知之幕),而且各个地位上所得和所失的功利也不确定。那么人们的选择标准就会从“平等”要求转变为“避免处于最差的境地”的要求。为此,他

会分析各种情况下可能产生的最差境地,然后在各种各样的最差境地中选择最好的境地,这就是“最大的最小值规则”:按选择对象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来排列选择对象的次序,然后我们将采用这样一个选择对象,它的最坏结果优于其他对象的最坏结果。^②简单地说,就是选择在最坏的情况下能得到最多好处的分配原则。这样一来,由于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会处于全社会最差的地位,所以必然会使这个最差地位的人们更多的“照顾”,从而保护自己。根据罗尔斯对“无知之幕”的假设,由此得到的价值选择应当是正义的选择。罗尔斯由此导出了这样的结论:保护社会最弱者的利益符合正义的原则。

这些表面看来似乎很精致而严密的理论,其实是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假定的基础上的:处于无知之幕后面的人进行价值选择时,不是出于道德感、同情感,而是出于自利性的自我保护,会作出最保守的价值选择:自己会落入社会地位最差的人群之中。而这直接与“无知之幕”假设本身相冲突。为什么呢?为了彻底坚持“无知之幕”的假设,在原初状态中,由于无知之幕的掩盖,立约者对个人以及社会的情况都不知晓,这样他们就无法对各种或然性进行计算,我们也不能给予每一种情况以相同的或然率,因此,只有选择在最坏的情况下能得到最多好处的分配原则。^③然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既然立约者对自己将处的状况一无所知,为什么要选择自己一定处于最坏情况呢?在这里,各种不同境况之间的对称性(无知性)破缺了,最差的境况的概率突然跃升为1,其余的境况的概率突然变为零,“无知之幕”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罗尔斯陷入的第三个悖论:最大的最小值选择悖论,其实质是无知之幕的悖论。

对于罗尔斯在这里所遇到的矛盾,前面说过的最早提出无知之幕观念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萨尼。尽管他很欣赏罗尔斯原初状态的概念的设计,但罗尔斯选择最大最小值规则作

①②[美]罗尔斯:《正义论》,第145、147页。

③朱华彬、曹允青:《对最大最小值规则的质疑》,《理论界》2010年第9期。

为原初状态下参与者的选择规则,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逻辑矛盾。他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反例:一位住在纽约的青年人同时得到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纽约,但是工作繁重乏味而且报酬很差;另一个在芝加哥,工作有趣报酬又高。但你要到芝加哥工作就不得不乘飞机从纽约飞到芝加哥,但这就冒着飞机出事而丧生的风险。由于“无知之幕”的假设,对这种风险的概率是不知道的。于是根据最大最小值规则,你应该选择纽约的那个工作,但这显然是错误的、违背公认常识的决定,因为飞机事故几率足够小,不应当影响你的决定。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会排除对自己将来所处的境地的各种可能性的预计,在此基础上选择最优方案。但这样一来,“无知之幕”本身就不复存在了,罗尔斯“精致的”理论也就立刻瓦解了。

罗尔斯理论所必然遭遇的“平等悖论”与“最大最小值悖论”,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平等的正义性、对弱势阶层保护的正义性,并非来自所谓“无知之幕”下的人们所做的选择,而是来自社会关系实践。前面说过,人类社会实践要求:全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则,

它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而不断将人类从背离这一原则的错误道路上拉回到它的轨道上。而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决定意识,创造社会财富的下层民众必然会将“平等”作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而处于高层社会地位的人们会利用自身所掌握的物质力量——生产资料所有权、有组织暴力机器与社会文化机器等等,维护不平等的等级秩序,打压这种平等诉求。而当这种打压严重阻碍社会发展,严重威胁“社会人的生存与发展”,使社会无法运转下去之时,下层社会的平等诉求就会得到部分实现,并且通过所谓“同情”机制而成为关于“平等”的相对普世价值。至于何种平等诉求、其在何等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得到实现,则取决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程度与可容纳程度。至于对弱势阶层的利益的维护,正是这种平等诉求的一种相对表现形式。这些正义观念并不需要通过虚无缥缈的“无知之幕”来得到,而是由实实在在的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过程所生成。

(责任编辑:杨嵘均)

Paradoxes in Rawls' Theory and Justice Generated in Practice

LU Pin-yue

Abstract: Rawls set the “pure justice” as the supreme universal value and took it as an ultra-utilitarian idea; however, this kind of justice is still built on the basis of “utilitarian balance”. He wanted to pull people out of their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put them into an initial state (i. e. behind “veil of ignorance”) to obtain the value criterion of justice. But once people leav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practice, they will lose their ability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justice. In addition, he believed that people behind “veil of ignorance” would choose institutional designs which would make the persons in worst social status have the best condition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selves from the worst situations. However, such a theory does not only recognize the legitimacy of inequality as its prerequisite, but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eality as well. In fact, the concept of justice is generated in human practice. A just social system is establish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man as a whole” through the inner link among people, and the goal of the justice is to achieve fundamental human purposes, i. 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justice-utility paradox; veil of ignorance; maxi-min paradox; practice-based generation